

卷端书名“鳳”字下，漏掉“洲”字，连书名都弄錯了。字体多为方体，不够美观。《朝野新声太平乐府》虽为写体，而字体潦草恶劣。至于行字歪斜，墨印濃淡不均，更是普遍現象；当然其中也有比較工整的。排字工不小心，有时漏排成空格，有的把个别字横排，或倒置。如上述《毛詩》中的“自”字横排。在《鹤林玉露》卷三第四頁反面看到“有駉駉”的“駉”字則为倒摆。听说有位外国人，发見正德十三年(1518)本《史記》四十八卷的“八”字，也是倒摆。这些偶然錯誤，今日恰成为鉴定活字本的有力证据。

关于明木活字排印工姓名所知者，比銅活字印工更少。仅有《鵬冠子》板心有“宁”字，《璧水群英待問会元》为姑苏胡昇繕写，章凤刻，赵昂印。《含玄先生集》卷末有“品三系书刻”五字。《黔南类編》序文，楷书大字，板心有“陈敬所刊”字样，惟全书方体活字，不知是否亦出其手。

我国的木活字，不但在国内影响了西夏及維吾尔兄弟民族，又推动了亚洲各国的印刷事业。如王氏高丽一三七六年印《通鑑綱目》，李氏朝鮮太祖三年(1395)頒印《大明律》百余本，都用木字。正宗李祹壬子(1792)命仿我国武英殿聚珍板式，用黄楊木刻大小三十二万余字，名曰“生生字”。民間方面則用

木字来印詩文集与家譜。

活字术于一五九二年由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鮮，又傳入日本。日本称为“一字板”或“植字板”，又称“聚珍板”。他們认为这个来自朝鮮的新法很方便，于是公私都乐于采用，庆长(1596)以后大为流行。而最大的工程要算天海僧正費十二年(1637—1648)工夫，以木字刊印全部《大藏經》六千三百二十三卷。

越南采用活字比日本要早。天順六年(1462)明遣正使錢溥使其国，与其国相等唱和。第二天即印成詩集。^⑧能这样迅速出版，自非活板不可。这本詩可能包括国王黎圣宗(黎灝)的詩。黎灝自己是詩人，当时他写了律詩十首，送給錢溥。其中有句云“比屋絃歌师孔孟，累朝簪笏頌唐虞”。充分显示了在他統治下文化教育的发达。可惜这本中越友好唱和詩集，中越两国均已失傳。現存較早的摆本，有黎朝永盛八年(1712)的《傳奇漫录》。据说阮朝政府曾向我买得木活字一副，嗣德皇帝《御制詩文集》即是用它来印刷的。

⑧ 明强昆《汝南詩話》(正德九年刊本)“祝太守廷瑞尝为予言：天順間錢溥学士使安南，与其国相等倡和，明日即印成詩集，此活字板也。……”

八百年前的“目录柜”

竹 庵

旧日公私藏书，都用书本目录，联頁著录，类同簿記，故遇增补續綴，就难以为继。或者感到不便，譏为“流水帳式”的簿录，似未公允。书本目录因为旧时产物，然使录目能傳之久远，考鏡学术源流，多賴于此。今后且将精益求精，以适需要。

二十世紀之初，西方經營图书馆的方法流入我国，目录采用卡片式，納于抽屜，貫以鋼条，装于厨柜，逐屜插箋标类，通称为“目录柜”。每屜可容卡片千余張，增减刪动，随意而安，既便管理，尤便檢查。但若流傳，仍須取助于书本目录。

学术界搜集資料，向亦采用书本式，感于卡片式之灵活便利，仿而效之，并进而制定格式，作为輯录資料之札記，或盛以簡制紙匣，或分类貯以特制厨柜如“目录柜”之式，使資料能够集中，参互比

勘，尤能巨細不遺。近时各部門資料工作，几乎悉已采用卡片式方法。

南宋时李燾仿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之例，作《續資治通鑑长編》一千六十三卷，积四十年精力始得成功，前人治学，耐心持久，勤奋艰苦，往往如是。

李燾编写此书輯录資料的方法，即設置十只厨柜，每厨柜装二十个抽屜，每个抽屜按干支标签紀年，凡本年之事，即录下归入此屜，再按月日先后次第排列，故史事虽繁蕪多端，著录終能井井有条，主要的關鍵是創制厨柜抽屜为积累資料之工具及其排比資料之方法。此項厨柜抽屜实即今日“目录柜”之先导，以時計之，距今将八百年，不仅为吾国文化史上一段佳話，且值得继承其遺法，改进而发揚之。